

汉字的读音机制

——方块文字符号如何标示语音

朱 一 星

〈要約〉

漢字の形・音・義を、文字論的に改めて考察すると、伝統的な訓誥学（小学）では見えていない側面がいろいろ発見できる。

例えば、「形声」と言われる漢字の「声符」は、従来漢字の「発音」を「表わす」ものだとして認識されるが、しかし、声符の役目はいわゆる音声学的な「絶対音価」ではなく、せいぜい、「声符」の漢字と「同音」か「近似音」であるに過ぎない。しかもそれもその漢字の誕生「当初」の話である。全体的に、古代中国の漢字「読み」の多くは謎めいた迷路の果てに隠れており、字典に記述されているものは、漢字同士の「同音」かどうかの「手掛かり」に過ぎない。

本稿では、言語の音声面だけでなく、言語の意味にも関わる漢字が、その標意指向の文字機能とともに、いかに音声を標示するのか、またその仕組みに、純粹の標音文字（音素文字または音節文字）とどこが違うかを解明する。

〈キーワード〉

标意文字 默认读音 文白异读 音读和训读

笔者（朱一星2013，摘录转载于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105期）认为，汉字本质上属于既标示语意又标示语音的¹⁾，对应语言双层切分中“第一层切分”的书写符号，主张因其功能取向主要在于区别语意，故应该称其为“标意文字”。

为什么对于同时具有标音功能的汉字，不宜称其为“标音文字”，或至少平等地称“意音文字”呢？对于这一点，拙文先前似有言犹未尽之感。这里，笔者将进一步探讨汉字对应语音的一些不同于字母文字的特点，——有些事实对我们来说虽然平凡，却常被人们忽视或不屑一顾。

一. “语音”还是“语意”？

以教英语为职业的美国青年贾斯汀曾对笔者说他在大学时学过一些汉字，觉得挺难，许多字的读法都没记住。但不可思议的是，当他日后看到一些学过的汉字时，却还总能模糊地记得汉字的意思。贾斯汀的这种体验，在如今学习汉语人数不断增加的西方人中也许不是少数。然而，他的这番话，却勾起笔者记忆之中的另一位西方学者言及汉字时所写的相关论述。

谢拉德（Michael L. Sherard）教授的论文。登载在日本知名出版社大修馆书店的《月刊しにか》²⁾创刊号上，文中写到：

汉字不是表示语意而是表示语音的。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而不是标音文字，只不过是流传在西方世界的一个神话。

在我的大脑里，有着一大堆杂乱的汉字。……我的汉字知识虽然并不完整，但是所有知道的汉字在我的头脑中都与特定的语音挂钩。我先在大学用北京话学习汉字，然后大约十年期间，以日语、韩语、广东话、上海话一个地方挨着一个地方学习汉字。当初用北京话记住的汉字，有的后来又和日语的读音挂上钩。而用韩语学到的汉字读音，又会取代原先记住的北京话或日语读音。以后我去过香港，也从事过上海方言的调查。那时候的许多汉字又是跟上海方音或广东方言音挂钩的。但是在逗留日本的这十年中，以前和各地语言音挂钩的汉字，几乎已经都用日语在思维了。

就这样，随着数目的不断增加，遗忘的汉字也越来越多。有时候虽然还记得，但却已经和初学时的东方语言读音脱了钩。这种时候，在我头脑中是如何识别汉字的呢。其实倒也不难，我会利用我自己的汉字英语读音。因为我常常将日语翻译成英语，遇到认不出的汉字或词，就查汉英辞典，急忙中顾不上日语读音，这样的汉字往往记不住，如果还记得，那就是以英语的读音留在头脑中了。

……对我来说，作为语言使用的所有的汉字都是在头脑里和特定的语音挂钩的。³⁾

(原文刊载时是由中岛克子从英文翻译成日文，摘录时由笔者译成中文，文责由译者自负)

读者也许会觉得这汉字到底是标示(表示)语音呢，还是语意？为什么对有的人来说，汉字代表一个语音，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汉字却代表一个语意呢？说到底，多年来围绕汉字性质的讨论，是否具有实质性的理论含义？多年来讨论是否触及了汉字问题的本质层面了呢？是否把在汉字问题真正同语言学、心理学、符号理论紧密结合起来考察，透过眼花缭乱的各种表面现象去揭示汉字真正的符号价值了呢？

语言的“意”“音”关系，以及汉字和这两者之间扮演什么角色，这些现象互相牵扯向我们诉说了什么。我们从这些现象中能够得到一些什么启示？以下我们层层分析。

二. 前期研究

现代文字理论和现代语言理论的发展不是同步的。当二十世纪初索绪尔天才般地提出他的一系列关于语言哲学的理论思索以后，世界才能循着他指出的方向看清楚：语言学应该如此来操作。然而，长期以来，西方语言学还基本围绕着“狭义”语言，既语言的语音侧面展开，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字母文字是随音而变，组音示意的，单个字母文字的“功能取向”原则上是记录语音，是将语音“可视化”的符号技术。字母文字通过传递语音信号并在组合之后，才能达到对应语义的表达目的。所以，以字母文字语言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时，就是辨析字母背后的语音，至于现代普通语言学意义上的，共时系统地观察就不显得十分必要了。但是如此一来，汉字，这一完全不同于字母文字的符号系统也就一直未被置于近代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之内。许多关于汉字研究，要不是囿于传统训诂学的文字观，就是混同于以标音为其功能取向的字母文字。

传统中国文字学着重考虑造字者(或造字群体)的动机在字形中留下的痕迹，以及这一痕迹伴

随时代的变迁。这一研究态度为汉字获得了大量的历史上汉字演变的理由和细节。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帮助我们识读和理解古代文字，也为我们提供了源远流长的历史所积累的人文知识。同时，古代训诂文字学为匡正汉字的形音义，为历代汉字的规范化、合理化也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这不仅在古代当时，也为今天的字形整理，帮助我们优化汉字提供了良好的启示。

一方面，字源学因其本身的各种局限性，是无法为我们阐明汉字作为符号系统意义上的功能和用字原理的，这就是我们还必须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理由。因为从用字的观点审视汉字功能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发现造字时的每款理据对于今天的汉字标意功能来说，其实是不严密的。从汉字的符号理论来说甚至是不沾边的。在记忆汉字时，将理据绝对化就可能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

三. 解析汉字“表音”说

我们先要检点一下把汉字视为“表音”文字的观点是出于什么理由，如果这些理由在理论上不合适的话，我们就要寻找正确的解释以避免被引入误区。

从笔者力所能及的查阅范围来看，大凡主张汉字“表示”语音的观点是出于这样两个立场：一是受到传统汉字学中意符和音符这两个概念的影响，二是误认为语言是可以“音”“意”分离的物理现象⁴⁾。

声符即为汉字造字初时在字音上予以定位的一种标记，而意符则为汉字造字之初在字义上的另一种标记。尽管今天人们已经比较容易理解声符和意符作为标记并不一定是汉字音义的绝对值，汉字的使用一经约定俗成，汉字标示的语意或语音即使脱离造字时的标记也是无妨的。但是长期的习惯思维定势总让人觉得理据构件承担着为汉字表示些什么的观念。所以，面对“象形”汉字不敷使用，“形声”汉字急剧增加的场面，就会误认为汉字系统由“象形”“表意”转为“形声”“表音”了。

其实，把汉字的声符看作“表音”，同把“意符”视为“表意”一样，不符合符号理论的基本立场，事实上学界也早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逐渐倾向于放弃认为汉字的意符或声符对汉字的字义或字音发挥绝对作用了。

那么第二个汉字“表音”说又是如何运作的呢。首先要注意持这一立场的学者一般并不直说汉字是“表音”文字，而是从“任何文字系统都是表示语言的”这一真理出发的。笔者认为，这句话到此为止还仍然是真理，但是接下去就容易迷失方向。因为许多学者至今坚持认为语意存在于大脑意识之中，属于精神境界，而语音才是使空气震动所致，是客观的物理现象。让文字表示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谈不上是科学，所以必定是通过表示语音这一物理现象才说得通。

事实上汉字也好，字母文字也好，都是在表现某种语言，脱离语言的文字就不成其为文字。也恰好许多汉字“表意”论者自从失去了汉字的意符表示语意这一理论武器以后，正处于迷茫之中，所以此番汉字“表音”说，尽管和众多汉字使用者的直觉有所抵牾，却仍然在学界得以流传，极大地影响着一代汉字研究学子。

然而事实又是如何？

其实，即使将语言视为客观事物，犹如某种产品的思维方法非常诱人，但是最新的心理语言学，脑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语言是一种心理行为，是“刺激”与“反应”的产物。任何脱离大脑

参与的语言行为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将语言录音，将其变成物理性产品，但那也是以说话（录音）人和听话（听录音）人为前提条件的。只要存在说话和听话行为，就存在大脑语言中枢的参与，而任何语言的音义结合，既一个语音心像和一个语意心像的结合都是离不开大脑的意识活动的。而文字，作为“刺激”和“反应”的媒介，也同样能够作用于大脑，从而是能够参与语言活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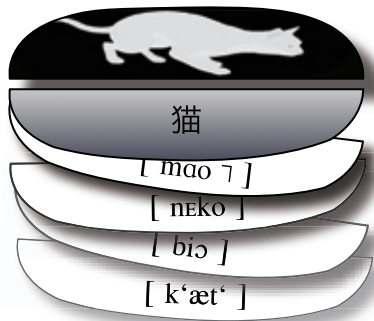
四. 汉字既能通达语意，也同时通达语音

回到本文开头的疑问，为什么贾斯汀能够见到汉字想起某个意思呢？原来汉字激活了他大脑中的某个语意心像。自然，对贾斯汀来说这个语意心像是以英语音相伴的，所以他能够说出所见汉字的字义时，当然使用的是英语。却说不出汉字的读音（指当初学的汉语读音）。

一方面，谢拉德教授又为什么忘记了汉字的汉语（或日语、韩语、广东话、上海话等等）读音，却能想起“和英语挂钩”的语音呢？其实，这里所说的“英语的”语音，并不是游离于大脑以外的“空气振动”，恰恰是他明确表明的“翻译成英语的”读音。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地断定那是一个英语的“音意”结合。而教授忘记的，是“汉语的”（或日语的、韩语的……）音意结合。敏锐的读者在此处不可能忽视一个重要细节：同一个汉字的英语语意和汉语（或日语、韩语……）语意必须是等价的。那么，换句话说，教授忘记的是汉字的汉语（或日语、韩语……）的读音而记住了汉字的意思。

原来贾斯汀和谢拉德所叙说的体验并没有区别：忘记了汉字的（本）音，记住了汉字的翻译。

依照笔者的说法，那就是两位美国汉字学习者按照默认读音的原理，“我行我素地”以英语读音来念汉字标示的语意了（见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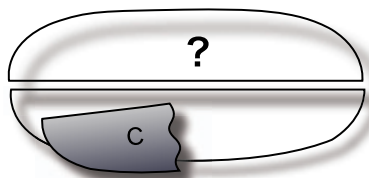
汉字不具有绝对音值！现代汉字理论基于整个汉字圈多种语言的汉字来研究“同一个共时系统”的汉字。我们发现原来汉字对于不同地区和不同语言的使用者来说，具有不同的“地区默认读音”。不同地区的汉字使用者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有音有意的词语。

图一：汉字对应带语意的语言切分

要问为什么汉字能够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如此“移植”？那就只能从汉字对应的是语言中保留语意的片段这句话来说明了。

我们知道由于大多数汉字对应的是带有意义的语言分段，所以一旦学过的汉字往往能够让人见字知义，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作汉字的标意功能。而字母文字对应的，是将语言进一步分割后形成的更“细小”的分段，这些分段“细小”到不足以标示语意。由于字母文字是绝不可能单独使用的，它们必定以各种方式组合起来，并以足够大的组合形式标示一个语意，这种“更大”的片段，才足够承担标示语意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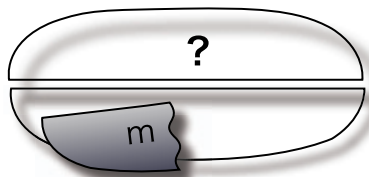
这里所说的“细小”的，和“更大”的分段，就是马丁内的“双层切分”思想了。试看下面的示意图（图二）：



① 字母“c”，在英语使用者大脑听觉区激活 /k/ 这一语音心像，但是不足以激活任何语意心像。



② 由三个字母符号“cat”按规定字序激活语音心像 /k'æt'/，才够条件在左脑语言区激活一个语意心像“猫”。脑际浮现一个连音带意的英语词。



③ 同理，“m”在人们大脑听觉区激活 /m/ 这一语音心像，但是不足以通达任何语意心像。由于没有音意结合，甚至无法判断是什么语言。



④ 由三个字母符号“mao”按规定字序激活语音 /mao/，再添上超音位语调组成 /mao ˥ /，就够条件在左脑激活语意心像“猫”。脑际浮现出一个连音带意的汉语普通话词语。



⑤ 由于汉字基本是连音带意的文字符号。许多汉字在激活语音心像之前，就能在左脑通达语意心像。脑际浮现一个连音带意的词语。

图二：标音文字对应的语言分段“细小”到不足以标示语意……

五. 联绵词的单字只是为了标音吗？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汉语中有许多词语是由单个汉字的语意衔接而成的，但我们还是不能简单地就此认为汉语词汇的任何语意都可以分割到单个汉字，因为许多组词标意的汉字常常“虚化”了它原先拥有的语意（指字典释义）⁹⁾。若将汉语以字组词视为“拼义”未免粗疏，而将汉语的语法基本单位归结于汉字，则更是有失于无视了语法单位和文字单位的不同。

那么，这是不是说现代汉语大量的复合词也象上面图二所示那样只能对应“不足以标示语意”的一个纯粹标示语音的“片段”呢？既然我们不能否定汉字的标音功能，那么也就无法排除汉字在相当一部分语言行为当中充当纯粹标音的符号。尽管如此，笔者仍然并不倾向于认为汉字的功能取向是标音。

考察这一问题的最典型的语言材料，莫过于联绵词了。

认为汉字是标音符号的汉字“表音”论者，大都会用联绵词来举例说明汉字在联绵词里不可能具有任何语意。只是一个单纯的音。但是笔者仍然倾向于认为即便在联绵词里，汉字还是表现为标意的功能取向的。

因为理论上纯粹的标音文字，必须满足如下的条件：即文字和文字之间的“区别性特征”必须显示语音上的对立，或者说标示相同语音的字母文字原则上是可以任意交换的（互为异形但具有同一性）。比如英语的大小写字母虽然字形不同，但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互相交换的。日语中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尽管在正字原则上各司其职，即一般以平假名书写日语的词音，而以片假名书写外来词的词音。但是即使倒过来使用，也仍然能达到标示语音的目的，只不过让人看着不顺眼，或故意因此达到某些“言外的”气氛。

在英语中，同样 /k/ 的发音可以用字母 c 或 k 来表示。据说古代极少使用 k 字母而多用 c。后来 k 也开始混用。cat, cut 就曾经一度拼写成 kat, kut 过，但是渐渐老习惯还是保留了下来。一方面古英语的 cing, cyind 则变化成现代英语的 king, kind。这些字母交换并没有造成发音上或者词义上的实质性变化。

汉语里的通假字，也毫无疑问属于一种纯粹标音的文字使用行为。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假借字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有限范围内的，所以文字学家说得出哪个字和哪个字互为通假，而不是所有同音字都可以毫无限制地通假的。更何况有些假借字“借而不归”，比如“北”和“牙”的本字演变成形声字“背”和“芽”等，原来没有区别的两个音之间，就产生了某种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显示汉字标意的功能取向的明证。

在“本无其字”的状况下，以同音字代表一个新的语言，是不得已的，也是极为自然的。然后在文字交流过程中渐渐放弃一个在语意上没有区别性特征的汉字而采用、或创造一个具有语意上的区别性特征的文字，这不正是说明汉字的功能取向是标意的吗？因为书面交流是一种社会行为，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自然的集体无意识行为。

回到联绵词上来，我们就会发现一些不常用的联绵词往往具有许多同音异形词，然而越是使用频率高的联绵词，使用专职文字的可能性就越高。比如“琵琶”和“枇杷”，虽然同音，但不是同义词。很难想象写一个“枇琶”或“琵琶”能让人“因声求义”达到通达语意的目的。同理，“麒麟”、蜘蛛，蝙蝠，螳螂，蟋蟀（虽然可作蟋蟀，但显然不宜作“西帅”）、葡萄、柠檬、橄榄等等也都如此。

也有倒过来的时候，中国地理学会的王越考证出“胡同”一词出自元代的“衚衕”，可以说是从专职联绵词（字）转向同音的普通汉字的例子。从理论上讲，如果历史上所有的汉字都能实现大面积地同音通假，并且不再制造新的形声字，那么汉字系统才有可能过渡到真正标音的文字系统。换个说法也可以认为：形声字的大量产生，不仅不证明汉字系统步入了“表音”阶段，相反是在大量制造语意上具有区别性特征的同音汉字，正是汉字标意功能取向的体现。

六. 汉字不具备绝对音值

笔者已经就汉字和语音的对应关系做过一些论述，认为汉字既不是和语言音无关，也不象字母

文字那样具有稳定可靠的对应关系。而是按照汉字的使用者的习惯对应其语言音的，在汉语使用地区里就表现为对应方言方音；在汉语以外的汉字使用地区，则对应当地民族的语言音，比如日语或韩语等。这种因地不同的读音，笔者称其为“默认读音”（朱一星2013）。

在旧年代里，跨地区，跨国界的人员交流有限，人们往往听不懂对方方言，于是读书人就会使用“笔谈”达到交流的目的。但是要注意文字和语言是不能混淆的，并不等于说：只要会写汉字，不同语言之间就能无障碍交流，古代东亚地区的知识阶层之所以能用汉字交流，还因为知识阶层共同掌握了古汉语文言文的缘故。离开了文言文，单依靠汉字也许只稍比用手比划强一些罢了。

七、汉字的“以意摄音”——对应语言的多层次和多语源（文白异读和训读）

除了汉字的“地区默认读音”特点以外，我们更要注意汉字“以意摄音”的性质，恐怕唯有标意文字才具有这一标音方法和特点。这就是汉字的文白异读现象和训读现象。

如果说汉字存在因地区、因语言不同的默认读音，对大多数汉字使用者来说并不一定是经常意识到的话，那么汉字的“以意摄音”则是同一个集体共时意识到的语言文字现象了。

所谓“文白异读”，是反映汉语的各个方言语音层次的现象，它的特点在于同形同义但不同词组里的汉字读不同的音（倾向于单字白读，组词文读）。由于这种组词读音具有较多的习惯色彩，在外人看来不容易分辨，但在汉语方言中较普遍地存在。北京话中就有不少文白异读音，比如：熟（熟悉／面熟）血（血液／流血）等；也有受南方方言影响而成为异读的字，如：咖（咖啡，咖喱）；卡（卡车／卡壳）等。在上海话里，则比如有：儿（小儿子／小儿科）；日（日记／礼拜日）等。一般认为：文读是用方言的音系模拟标准音，白读是方言土音。所以文白异读最普遍的特点是，文读一般比较接近官方标准语言。但是据说也有不符合这一解释的一些例子。但是普遍都表现为以《广韵》声韵系统为共同起源的不同方言音。至于语言学上的原因，刘勋宁认为：

对汉语来说，最权威的读音自然是随着书面语传人的音。我们在1985年的文章中说过：“官话方言有许多派别。不同派别的方言之间地位并不平等，在历史上也互有升沉。”这种地位的变迁，自然会给书面语的语音标准带来影响。因此此一时，彼一时的不同标准，就不能不在方言的输入中留下痕迹。就像树的年轮或者地质层一样，给我们留下观察和研究的标本。对我们来说，文白异读实际反映的是共存在一个语言或方言中的同源成分的不同语音形式，而这种不同形式折射了历史上的标准语和方言关系。（刘勋宁2003）

和文白异读类似的另一个显示汉字“以意摄音”性质的是训读。汉语的一些方言中都有训读现象。同时，训读也是日本汉字读音的一个极其普遍的读音法，就是用日语词汇的发音来念相同意思的汉字，由于汉字的近义字，同义字十分丰富，就和日本的读音形成多重的“字=音”关系，加上汉语对日语汉字的不同时期的影响，造成日语汉字读音复杂多变。处于这样的语言文字环境之中，人们对“语言音”和“字意”之间的关系十分敏感，常常有一些能够运用自如的高手。言谈间，说话双方大都能随时意识到语言和文字的对应，其中有比较固定的，也有不太固定的，或者完全是

即兴而为。有时将英语的读音配上汉字，如：絲綢之路=シルクロード（Silk Road）之类的搭配，可以说在当代日本语言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汉字彻底融入日语，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大约始于距今1300年前，可为久远矣。笔者认为作为标意的汉字如此般地融入另一个语言系统，也许应该被视为人类文字技术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了。著名的日本汉字学家白川静对日本知识界如何接受汉字这样写道：

汉字不仅以其音，更加上其译文之训，而侍奉于国语。经过漫长的试用年代，其成果在〔万叶集〕的绚丽言辞中得以充分地发挥。而更以〔万叶集〕中〔柿本人麻吕歌集〕的言辞所见之简洁自在，显示汉字业已完全国语化，已经作为国字在我国安家。其后在平安朝以降，我国的知识界就运用国语化了的汉字知识和克服文法障碍的反读法，能够自由地阅读汉文典籍了。大量汉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进入所谓的国语领域的。

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详尽地描述训读本身的情况。笔者可以在此将文字（这里对字母文字指的是词）和语言，语音之间的异同关系列为一表以示诸位学贤：训读现象和文白异读现象都说明“以意摄音”是汉字作为标意文字的一个鲜明特点。如下表中项目⑤所示，文字以字形（语意）统摄不同读音的现象，或许只有汉字才能实现。语言学家铃木孝夫在二十多年前就指出，正因为汉字能够以一个字既代表现代口语语言，同时又代表高层次科学书面语言，所以日本人只需要具有汉字的平均知识，就能轻松地阅读难度较大的各种高层次书籍⁶⁾。

①	②	③	④	⑤
多义字	多音字	同音字	同源字	语音层次/语源
homonyms	heteronyms	homophones	paronyms	?
会(-见/能说~道)	行为/银行	鹰婴英樱	家/专家	献血/流血
pole(棒)/pole(极); sea(海)/see(看)	tear ^[1] (哭)/tear ^[2] (撕)	write(写)とright(对)	wisdom/wise foreword/preface	?
同形同音/异义	同形/异音异义	同音/异形异义	同源派生	同义同形/异音
				文白异读 训读 (日) 汉音/ 吴音/唐音

表一，文字，语音，词义三者关系中，文白异读和训读是标意文字的特征

八、理解汉字符号如何对应语音音

因“言犹未尽”而展开的对于汉字标音方法的表述，似乎还没有让人感到满意。但愿关键立场和主要思路以及相关问题能够表达得足够清楚。近年随着对汉字的认识的不断加深，感到汉字问题上的种种误区太多，往往在说明“是什么”的同时，还要加倍小心地注意说明“不是什么”。

比如世界上否定汉字“表意”的观点本来不但是能够接受的，但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主张汉字是和字母文字无异的“表音”文字的观点则让人觉得欠妥。

因为字母文字的确是由语音通达语意，所以汉字“表音”论不胫而走。据笔者观察，这种观点在中国、日本、美国等世界范围影响了很多学者，而且在年轻学者中间也受到推崇，甚至有不少人即使汉字的性质讨论与其研究不发生直接关系，也会像念经似的将“汉字表音”理论描述一番。

正确的理解应当是：汉字的标意性和标音性本来是并存的，但是当我们理解了汉字的标意性对其所标示的语音具有统摄作用的话，就不难理解，汉字的标意功能是主要的，称汉字属于世界上目前仅存的“标意文字”应该是恰当的。

笔者的说明如果没有被误解的话，那么，今后认为汉字也和字母文字同样是“表音”文字的主张者，就将面临一个抉择：要么对汉字的“以字意统摄字音”的事实作出新的解释从而坚持任何文字都必须通过字音才能理解语意的模式，要么承认汉字的标意功能取向从而走出认为汉字是“表音”文字的误区。

后注：

- 1) 这里指文字功能同时标意又标音，不是有的汉字标意，有的汉字标音。
- 2) 日语“しにか”（Sinica）拉丁文，意为中国，或中国学、汉学。
- 3) Michael L. Sherard 1990, 33页
- 4) 一般认为首次提出汉字为表音文字的是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名义1979年发表的《古文字研究工作的现状及展望》，而根据姚孝遂近年发表的专著可知该文字属姚孝遂之作。一方面夏威夷大学教授德范克的《汉语——真实与神话》[John DeFranc.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M].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October 1, 1984)]的参考文献中未见对姚文的引用，目前只能认为德范克也可能是独创的汉字表音说主张者。
- 5) 孙银新把复合词中改变了“原生”语意的汉字，称为“移植”词素，或“移用”词素。见孙银新(2003)。67-114页
- 6) 见铃木孝夫(1990)第4章。本人在2013年引用该著作时写错了作者名，特此致歉并予以更正。

参考文献

- 李行杰 1987 通假字的消长与正词法的确立 《语文建设》1987年第5期, pp.22-27
- 许宝华 汤珍珠 1988 《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
- Norman, Jerry (罗杰瑞) 1988 *Chinese*, Cambridge, (张慧英译《汉语概说》，语文出版社, 1995
- 铃木孝夫 1990 《日本語と外国語》，岩波书店，东京
- Michael L. Sherard 1990 西欧から見た漢字文化 《月刊しにか》 Vol.1, pp.31-35
- 白川 静 2004 《新訂字訓》，平凡社，东京
- 2005 《新訂字統》，平凡社，东京
- 孙银新 2003 《现代汉语词素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
- 刘勋宁 2003 文白异读与语音层次，《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4期, pp.1-9
- 唐 七元 2008 吴方言与非吴方言同源词初探，《语言科学》 Vol.36, pp.526-538
- 王 越 2009 “胡同”一名源于汉代的“巷”，《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ol. 7 No. 2, pp.38-44
- 王 敏 2009 从“堰塞湖”谈文白异读词的读音确认，《语文建设》2009年05期, pp.67-68
- 姚孝遂 2010 《姚孝遂古文字论集》 中华书局
- 朱一星 2013 如何界定汉字的理论单位，京都外国语大学《研究論叢》 No.81, pp.129-139

